

本报记者卢刚、强晓玲、易艳刚、  
胡锦武、张博令、郭慧颖

“我们需要我们的进攻，从新的小的部分的胜利，逐步变为很大的一个到最后的胜利。”

“在这种关头，所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，都应该对自己说，我们应该站在前面，领导其他同志到战线上去工作。”

这是1935年1月21日《红色中华》报第264期头版头条(列宁的教训)中刊出的一段演说。

眼前这片残破的报纸，纵23厘米，横44厘米，只

有整张报纸的三分之一，《红色中华》报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。

它是国家一级文物，静静地陈列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里。

在新华社庆祝九十华诞之际，翻阅这张报纸，追寻新华先辈的奋斗与牺牲，让人惊叹崇敬，热血沸腾。

瑞金寻访《红色中华》报，对我们而言，也是一次“魂牵”，更加领悟作为新一代新华人，为做好党的新闻事业，应该干什么、怎样干。

### 不朽的报，红泥土房后人

从瑞金市向东，再往北拐个弯儿就是叶坪镇，远远望去，圆拱形大门上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”的牌匾分外夺目。

踏上一段鹅卵石小路，闪现一座青砖黛瓦的客家建筑，高峻的“四叠式”马头墙翘首碧空，90年前的

1931年11月7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诞生在座有几百年历史的“谢家祠堂”里。同日，“红色中华通讯社”简称“红中社”宣告成立。

在一间红土房前，“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”的牌匾映入眼帘。

1931年12月11日，红中社开始出版印刷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《红色中华》，并成立了“红”中编委。

听说我们一行来自新华社，为我们讲解的工作人员黄露芬兴奋地说：“新华社的前身就是红中社啊！欢迎回家！”

展厅里，墙上陈列着《红色中华》报早期负责人、工

人员名单，一张黑白照片上，王观澜、周以栗、李伯韬、钱希均、李一氓、杨尚昆、沙可夫、韩进、任质斌、瞿秋白、向仲华、廖承志……年轻的面庞，目光坚定。

1936年，杨尚昆回瑞金，来到已摆上陈列品的这个展厅，在“坐定回音”办公桌边倾诉万千。当年他在这里写稿，办报，“现在回来，拿起这个笔，我感到非常亲切，就好像这是回到当年。”

作为传承《红色中华》报红色基因的新华社报纸——《新华每日电讯》的编辑记者，我们屏息凝神，翻看眼前两大本厚重的《红色中华》报影印合集。一篇篇响亮号角的战斗檄文、一幅幅生动鲜活的插图漫画，仿佛把我们带回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；一群心怀革命理想的年轻人，在战火又充满希望的苏区以笔为枪，书写人民政权中央机关报的开端，开创真正属于人民的新闻事业。

“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治国理政试验田，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试验过、预演过。”黄露芬向我们介绍说，《红色中华》报是中共党报早期红色政权建设的记录者、宣传者、组织者，更是中国人民新闻事业早期的见证者。

90年前，《红色中华》报在党的指挥下，忠实记录党和红军胸怀救国救民理想、不屈不挠干革命的历史伟业；

90年前，《红色中华》报满怀激情宣传党的革命主张，一纸风行红土地，唤起工农千百万；

90年前，《红色中华》报艰苦卓绝写忠诚，孕育红色基因，淬炼新精神，成为一代代新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之源。

### 为党办报，艰苦卓绝写风华

《红色中华》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，他的任务是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……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，使革命在一省或者几省首先胜利，以达到全国的胜利……”

这是刊登在1931年12月11日《红色中华》报创刊号第一版的发刊词。

1931年11月7日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

会(简称“一苏大会”)在江西瑞金隆重开幕。

“一苏大会”通过《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》，依据当

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还没有哪份党的机关报的情况，明

确提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“建立健全党报”。

“12月11日，《红色中华》报创刊，红中社与《红色中华》报社两块牌子一个机构，担负播报新闻和出版报纸的任务。”对《红色中华》报的历史渊源，黄露芬如数家珍。

1931年12月18日出版的《红色中华》报，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政府人员文告，委任周以栗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《红色中华》主编……”

这是1935年1月21日《红色中华》报第264期头版头条(列宁的教训)中刊出的一段演说。

眼前这片残破的报纸，纵23厘米，横44厘米，只

有整张报纸的三分之一，《红色中华》报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。

它是国家一级文物，静静地陈列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里。

在新华社庆祝九十华诞之际，翻阅这张报纸，追寻新华先辈的奋斗与牺牲，让人惊叹崇敬，热血沸腾。

瑞金寻访《红色中华》报，对我们而言，也是一次“魂牵”，更加领悟作为新一代新华人，为做好党的新闻事业，应该干什么、怎样干。

# 艰苦卓绝写忠诚，一纸风行红土地

## 《红色中华》报及其镌刻的“新华精神”

正当红军，这例也没有什么稀奇(稀奇)。所以他们便一起而全体报名加入红军，日前他们已集中到补充师去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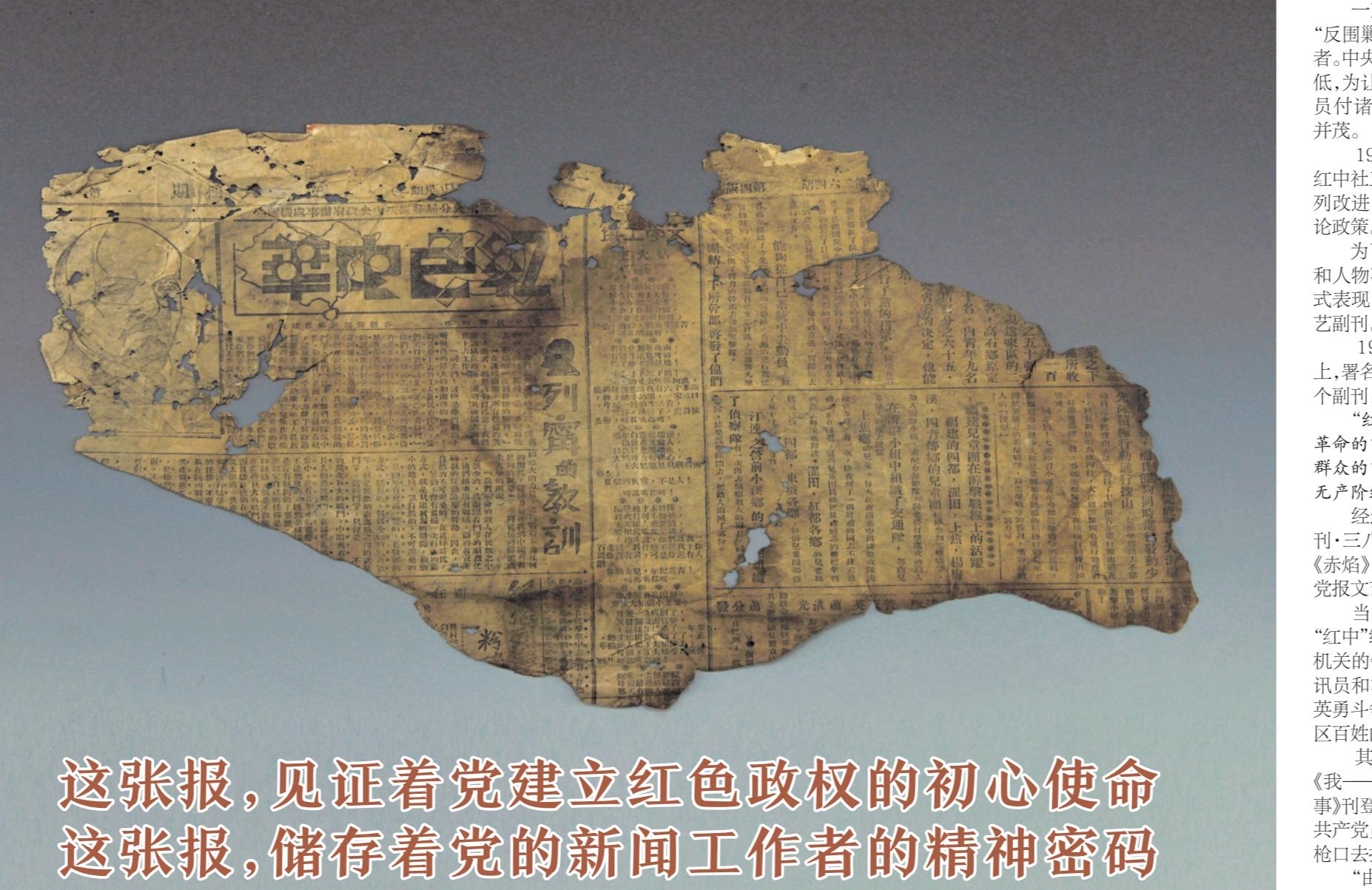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1934年5月30日《红色中华》报第195期第三版刊登的一则消息稿，题为《八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》，新闻里记述了瑞金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一家农民先后送8个儿子参加红军的故事，中缝还配了一幅漫画，在当时的“扩红”运动中引起轰动，掀起群众参军热潮。

一家送8个儿子参军，成为中央苏区人民全力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缩影。当年，兴国县长冈乡青壮年男子百人中，就有80人报名参军；总人口才24万的瑞金，有11.3万人参战支前，为革命捐躯的烈士有5万余人；赣南人口共有240万，为革命牺牲了33.8万人。

这种鱼水情延续到了当代。2003年据此编排的大型赣南采茶歌舞剧《八子参军》，一经推出就获得极大成功。当演到八子先后血染沙场，许多观众潸然泪下，一位开国将军流着泪激动地说：“当年，老区人民就是这样支持我们的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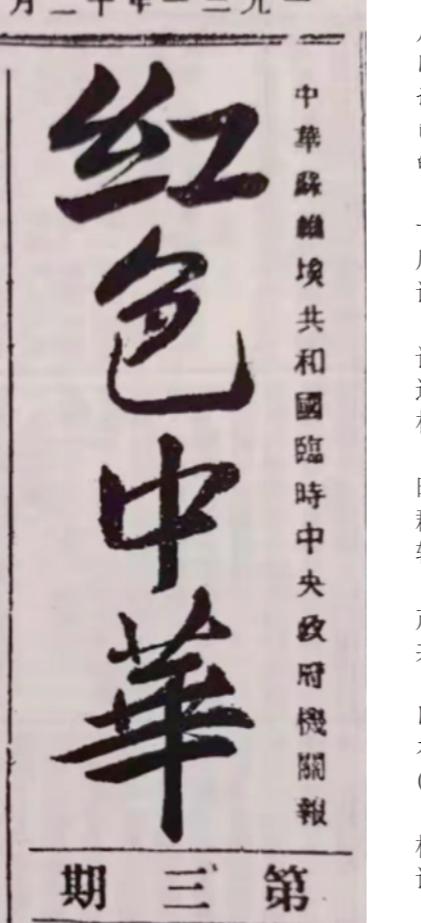
“八子参军”的故事，为什么群众会踊跃参军？因为红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！”瑞金沙洲坝94岁的杨世桃老人告诉记者：“以前的沙洲坝1000多人，有300多人去参军，每家每户都有红军。红军家属往往被照顾得很好，家家户户都分到了田地，有耕田队帮助耕田，还能分到当时很难买到的海盐。”

“《红色中华》报定价很便宜，当时根据版面收取一到两个铜板，让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够买得起。”黄露芬说，“它的语言风格非常贴近人民群众，而且有12000字，还要编绘苏区的消息。点的是桐油灯，灯光很暗。这是我工作时比较艰苦的一段，那时苏区工作都是很艰苦的。”



这张报，见证着党建立红色政权的初心使命  
这张报，储存着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精神密码

1931年1月21日出版的《红色中华》报第264期(一级文物)第一四版 资料图



八廿月二十一三九一

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和推翻國民黨的統

紅色中華

期三第

日八廿月二十

的同志是很少的，这其中大多数还是偏于‘森志’性(应为‘型’)的工作者，真正的‘新闻工人’，就更少一些……‘红中’应建立自己能够指挥和训练的通讯员，及自己整个的通讯网……另外我们用扁担挑着，来教他们的新闻学，如何做社论，如何写消息……要这样来创造苏维埃的新闻干部……‘红色中华’不仅是报纸，而且是学校，从事这一部门工作的干部的需要，已经放在了我们新闻政策的议事日程之上。”

这是摘自1931年9月6日《红色中华》报第108期，第一版刊出的毛泽东署名文章《今年的选举》中的一段文字。

“苏区开垦出来的地，到现在我们还在受益。以前种红薯，现在种稻谷，以前的‘粮仓’变‘果乡’了。武阳村支部书记邹华告诉我们：‘我们380多户人家，人均就有3.3亩地，是赣南脐橙的‘万亩村’，每年脐橙产值过亿，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。’”

展厅里，一张标注“1931年10月3日，川陕根据地机关报《苏维埃日报》刊登了《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》的社论，他到达苏区后，红中社成立了通讯部，规定按期把编辑部需要稿件告诉通讯员，随时对通讯员投稿进行指导。”

“《红色中华》报在培养读者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，例如让骨干通讯员参与编辑活动，举办通讯员培训班，给通讯员发送学习材料，包括怎样写稿，组稿，审稿，怎样从群众中发现素材。”瑞金市委党史办专员曹春荣说。

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、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，兼任红中社社长和《红色中华》报编委会主任，他以过硬的政治素质和深厚的理论修养，临危受命，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就将红中社从一个内部刊物《工农通讯》，发展成了“反帝反封建”的旗帜，成为无产阶级的喉舌，奠定了红色中华报在苏区群众中的影响力，很快在苏区传播开来。

“由于读者群体绝大部分是文化程度偏低的工农大众，‘红色中华’报文字简练、通俗易懂，少用生僻字词，多用民间口语。”瑞金市党史专家严帆说，“当编辑部缺纸短缺，报纸在印刷设计上存在种种局限，但编辑们努力把版面做得好看。除了运用‘变化字大小’‘用几何图形代替文字’等编辑手段外，还增加了丰富宣传语言的插图和漫画。”

“由于读者群体绝大部分是文化程度偏低的工农大众，‘红色中华’报文字简